

白

国苑 中诗英华

文章合为时而著

歌诗合为事而作

放声《新乐府》

寄情《秦中吟》

《长恨》有余哀

《一曲》最关情



离离原上草
一岁一枯荣
野火烧不尽
春风吹又生

山东大学出版社

居

易

卷

111
L421
249

书

中国诗苑英华

白居易卷

龚克昌 彭重光 选注

山东大学出版社

P

1997年11月26日

中国诗苑英华

白居易卷

龚克昌 彭重光 选注

责任编辑 王延梯

封面设计 牛 钧

内版设计 赵 岩

责任校对 张华芳

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

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

邮政编码 250100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

7.75 印张 194 千字

1997 年 4 月第 1 版

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—3000 册

ISBN 7-5607-1746-2/I·129

定价:(全十册)118.00 元

序

王运熙

我国数千年的文化历史中，涌现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，诗歌、散文、戏曲、小说、讲唱文学等等，各体皆备。其中尤以诗歌成果更见辉煌，源远流长，大家迭出，真不愧有诗国之称。

中国诗歌具有光辉的历史。在先秦时代，先是以四言句为主的诗体流行，后经人们选录三百余篇，编集成《诗经》。稍后则是句式长短参差的楚辞体（亦称骚体）产生，被后人编集成《楚辞》。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两大源头，以其丰富的营养，哺育着后世千千万万的文人。到汉魏两晋南北朝时代，五言诗逐步发展昌盛，七言诗也逐步成长，五、七言古体诗成为诗歌的主要样式。在此时期内，作诗成为一种风气，名家辈出，灿烂多姿。之后是隋唐五代。国势强大的唐帝国，经济、文化发达，为诗歌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土壤。唐代是中国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，诗苑涌现出不少名家巨匠。诗体方面，除五、七言古体诗外，还形成五、七言近体诗。从此，五言古诗、七言古诗、五言律诗、七言律诗、五言绝句、七言绝句这

六种诗歌基本样式，长期为人们所遵用，直到现代。宋承唐代，文化、文学继续发达。在唐诗的高峰后面，宋诗往往写得机智而富有理趣，别开生面，与唐诗争胜。同时，在唐五代形成的词（定型的长短句），至宋代繁荣昌盛，形成了诗、词两体双峰对峙、各擅胜场的局面。在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之后，人们一提到中国古代诗歌，总是首先想到唐诗、宋词，它们标志着中国中古时期诗歌的辉煌成就。以后在元、明、清时代，五、七言诗和词继续发展，也产生了许多名家、佳作，但总的说来，诗人们以学习、宗法唐、宋为主，创造性比唐、宋较为逊色。此时期还出现了新型长短句散曲，也有名家佳作，惜表现的广度、深度比不上词。这时期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，转移到了戏曲、小说方面。

这套《中国诗苑英华》丛书，选择历代成就最为卓越的少数诗家、词家，编选其部分名篇佳作，供广大读者学习欣赏。于先秦取屈原，于汉魏两晋南北朝取陶渊明，于唐取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李商隐，于宋取苏轼、陆游、李清照、辛弃疾。这十位大家，代表了各个历史时期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，的确不愧为诗苑中光彩最为夺目的英华。他（她）们的诗歌内容广阔深厚：热爱国家民族，甚至愿意为之赴汤蹈火；关怀人民痛苦，希望社会安定；憎恨黑暗腐朽势力，予以揭露和鞭鞑；描绘山川草木，展示祖国和乡土的辽阔美丽；歌咏爱情和亲朋情谊，流露真挚深厚的胸怀，等等。这些，对于我们培养热爱祖国人民、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，认识古代社会的诸般情状，认识大

诗人的高尚品格，从而陶冶自己的情操，都将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。从表现形式看，十位大诗人都是第一流的艺术巨匠。他们构思深邃，才华横溢，语言精炼生动，技巧变化多端，风格或奔放流畅，或深沉顿挫，或平淡隽永，或缠绵曲折，多姿多彩，无不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，使我们获得丰富的美感享受，和从事创作活动的启发和借鉴。

弘扬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学遗产，是为了促进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品质和文化素养，为创作新时代的文学提供营养和借鉴。希望这套丛书在这方面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。

1996年12月

前 言

白居易（772—846）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诗人，他的诗歌，不论是当时或后代，在国内或国外，都发生过巨大的影响。在我国文学史上，还很难找到第二位诗人像他那样大声疾呼地为民请命，而语言又那样浅显通俗，易为人民所接受。我们称他为人民诗人，实不为过。

白居易乳名阿连，字乐天，自号醉吟先生，又号香山居士。因作过太子少傅，故后人称他为白傅。

诗人自称是秦代名将白起之后。白起被封于太原，故诗人自称太原人。白起后人自太原南移韩城（今陕西韩城）。至诗人曾祖白温再南迁下邳（今陕西渭南县）。祖父白锱又东徙新郑（今河南新郑县）。诗人即于代宗大历七年生于新郑。

诗人的曾祖父白温，高祖父白志善，始祖白士通都曾是朝中大官，至诗人祖父白锱、父白季庚才开始失势，只做过县令、州别驾一类地方小官。白锱长于五言诗，有诗集问世。白季庚为官清廉，多有政绩。母颍川陈氏知诗识礼，白季庚死后，她对诸子“亲执诗书，昼夜教导，恂恂善引，未尝以一呵一杖加之”。诗人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比较正直、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小官僚家庭。

白居易幼年随父在中原度过。十一二岁遇李希烈等叛乱。十四五岁避乱越中。当时苏州刺史韦应物、杭州刺史房孺复，官位既尊，又风流雅韵，极得诗人的敬慕。诗人暗想：“异日苏杭苟

得一郡足矣！”他这时也才知道进士科是通往这条道路的途径，因而立志参加进士试。诗人二十八岁在宣州参加乡试，一举中的。二十九岁参加礼部省试，又考取了第四名进士。但要想在朝中做官，还得参加相关的考试，所以他在三十二岁参加了“书判拔萃科”考试，三十五岁又参加“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”考试，又都以优异成绩及第。随后他被授为京兆府周至县尉。三十七岁任左拾遗，就在这一年，他与杨汝士之妹结婚。三十九岁左拾遗任期满，改授京兆府户曹参军，仍充翰林学士。四十一岁母丧居家守孝。四十三岁，诏授左赞善大夫。这是东宫官属，负责教导太子。四十四岁，宰相武元衡被暗杀，白氏率先上疏论其冤，急请捕贼，以雪国耻。当权者以为官官非谏官，不当先言事，又有人罗织其罪名，诗人因而被贬为江州刺史，再贬为江州司马。四十七岁，得崔群之助，代李景俭为忠州刺史。四十九岁，奉召回京，为司门员外郎，抵京后，除为主客郎中知制诰。五十岁，被授为中书舍人。五十一岁，除杭州刺史。五十四岁，改授苏州刺史。五十五岁告长假回洛阳。五十六岁除秘书监。五十八岁，诏为太子宾客，分司东都。六十岁，任河南尹。六十五岁任太子少傅，分司东都。七十二岁，以刑部尚书致仕。七十五岁病卒，追赠尚书右仆射，葬于龙门。

白居易聪明过人，自称：“仆始生六七月时，乳母抱弄于书屏下，有指‘无’字‘之’字示仆者，仆虽口未能言，心已默识，后有问此二字者，虽十百其试，而指之不差。”这虽有点神话色彩，但并不是不可能，人的知能至今未被了解的多得很。诗人“五六岁，便学为诗。九岁，谳识声韵”（以上见《与元九书》）。据唐张固《幽闲鼓吹》载：“白尚书应举，初至京，以诗谒著作顾况。顾睹姓名，熟视白公，曰：‘米价方贵，居亦弗易！’及披卷，首篇曰：‘……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……’，即叹曰：‘道得个语，居即易矣！’因为之延誉，声名大振。”《唐

摭言》也有类似记载。白居易写此诗在十六岁。据考证，白氏此年并未进京。有人认为以上记载纯属编造。但顾况于贞元五年以后贬官饶州（治所在今江西波阳），与苏州刺史韦应物有往还，白氏或在苏州见顾，也未可知。白氏此两句诗写得极佳，受顾赞誉是完全可能的。

白居易读书非常用功，他在《与元九书》中说：“十五六始知有进士，苦节读书。二十已来，昼课赋，夜课书，间又课诗，不遑寢息矣！以至于口舌成疮，手肘成胝，既壮而肤革不丰盈，未老而齿发早衰白，瞫瞫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也，动以万计，盖以苦学力文所致，又自悲矣！”他在三十五岁写的《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》还说：“攻文朝砭砭，讲学夜孜孜。策目穿如札，毫铎锐若锥。”我们从诗人遗下的诗、文、策等各种文体数量、质量，也可见其勤奋学习写作之一斑。

白居易从青少年起，就过着社会动荡不安、兄弟东西离散的生活，尤其是他二十三岁父亲死后，生活更无着落，如他二十七岁写的《将之饶州江浦夜泊》诗云：“明月满深浦，愁人卧孤舟；烦冤寝不得，夏夜长于秋。苦乏衣食资，远为江海游。光阴坐迟暮，乡国行阻修。身病向鄱阳，家贫寄徐州。前事与后事，岂堪心并忧；忧来起长望，但见江水流。云树霭苍苍，烟波淡悠悠；故园迷处所，一念堪白头。”可以看出诗人这时心事重重，愁绪满怀，这里有体弱多病之愁，有家人离散之愁，有事业未成之愁，但关键还是贫困之愁，因穷困而使他举步维艰。再看他二十八岁写的《伤远行赋》：“贞元十五年春，吾兄吏于浮梁，分微禄以归养，命予负米而还兮。……茫茫今二千五百里，自鄱阳而归洛阳。”要从兄“微禄”中分出养家费用，还要从“二千五百里”外的江西负米回洛阳，不是十分穷困，不是万不得已，谁会如此行事。同年夏另一首题目极长的诗开头即说：“时难年荒世业空，弟兄羁旅各西东。”可见在兵燹天灾的夹击下，他家那份日趋衰

落的祖宗遗留下来的产业，已荡然无存了。

诗人生活上的困迫，看似坏事，其实正因此而推动他走向人民，关心同情人民，并与其所受的教育结合起来，形成他的忧国忧民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。所有这些，我们从他的诗作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。

白居易的诗文原说有三千八百多篇，现尚存诗二千八百首。但即便如此，在唐代以前诗人中，他仍然是存诗最多、最伟大的诗人之一。

白居易的诗作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，贬官江州是个分界线。在贬官之前，他的兼济思想占主导地位，政治热情很高，时时关心国家大事，处处惦念老百姓生活，写出了大量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诗作。《新乐府》、《秦中吟》是其中优秀代表。这个阶段的诗重点表现了：

其一，大胆辛辣地讥刺最高统治集团的横征暴敛，巧取豪夺。《重赋》、《缭绫》、《杜陵叟》、《卖炭翁》、《宿紫阁山北村》等等，都是这类作品。《宿紫阁山北村》写他畅游紫阁村时，好客的老农请他喝酒。但他“举杯未及饮，暴卒来入门，紫衣挟刀斧，草草十余人”。接着抢伐树木：“中庭有奇树，种来三十春；主人惜不得，持斧断其根。”来人为什么胆敢如此公然抢夺？“口称采造家，身属神策军”，原来他们都是皇宫来人！而且还得到皇帝的纵恿：“主人慎勿语，中尉正承恩。”这首诗实际上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最高统治者本人。著名诗篇《卖炭翁》也同样把矛头指向皇室。老翁辛辛苦苦烧了一车炭，拉到长安市上去卖，但不幸被皇帝的走狗看到了，他们便“手把文书口称敕”，直接打着皇帝的旗号。“回车叱牛牵向北”，把炭拉到皇宫里去。“一车炭重千余斤，宫使驱将惜不得。半匹红纱一丈绫，系向牛头充炭直。”他们的行径比土匪还要令人厌恶万分。土匪直截了当打着抢劫的旗号，皇宫的所作作为也明明是在抢，却扔给卖主一点对

卖炭翁来说毫无价值的东西以示他们没有白拿，是在进行一场等价交换。

再看看《重赋》，那是一种比较隐蔽的貌似合法的敲剥。唐德宗废除租庸调，改行两税法。“国家定两税，本意在爱人。”这是先扬后抑的手法。“奈何岁月久，贪吏得因循；浚我以求宠，敛索无冬春。”表面上为皇帝老子解脱，实际上还是重重打在皇帝老子身上，因为皇帝昏庸贪财（德宗皇帝就极贪得无厌）才导致臣下的巧取豪夺。上有所好，下必予之。所以作者最后把这个谜语戳穿：“昨日输残税，因窥官库门；缗帛如山积，丝絮似云屯；号为‘羨余’物，随月献至尊。夺我身上暖，买你眼前恩。”原来这些东西很快就要转移到皇帝的帐上去了，他们是为皇上而行劫的。在官府沉重的敲剥下，老百姓哪有生存的空间。“岁暮天地闭，阴风生破林；幼者形不蔽，老者体无温。”他们都陷入啼饥号寒、奄奄待毙的绝境了。

其二，揭露封建王朝的黑暗腐朽，达官贵人的糜烂无能。《不致仕》鞭鞑了封建官僚们的贪位恋栈：“可怜八九十，齿堕双眸昏。朝露贪名利，夕阳忧子孙。桂冠顾翠缕，悬车惜朱轮。金章腰不胜，伛偻入君门。”年届八九十，齿落眼昏，腰弯背曲，步履蹒跚，却死抱禄位不放。封建王朝官僚的老人化，其实也正是其腐朽的表现。封建王朝不也正如这帮老朽一样，挣扎在死亡的边缘吗？这首诗是富有教育意义的。《登乐游园望》作者抒发他登乐游园俯看时的感叹：“车马徒满眼，不见心所亲。孔生（孔戡）死洛阳，元九（元稹）谪荆门。可怜南北路，高盖者何人？”作者这样说，无异于把王朝的达官贵人们都否定了。那些乘高车策驷马的达官贵人们，全都是无能之辈，无耻之徒，我一个也看不上；仁人志士不是死了，就是被贬谪到穷乡僻壤去！这也就难怪执政柄者看到此诗要“扼腕”，恨得咬牙切齿呢！

文官如此，武将亦然。且看《西凉伎》。所谓西凉伎，是指

当时沦陷区西凉的狮子舞。但当时的边将们却厚颜无耻地专取此舞寻欢作乐：“贞元边将爱此曲，醉坐笑看看不足；享宾犒士宴监军，狮子胡儿长在目。”所以作者无限悲愤地说：“凉州陷来四十年，河陇侵将七千里。平时安西万里疆，今日边防在凤翔。缘边空屯十万卒，饱食温衣闲过日。遗民肠断在凉州，将卒相看无意收。天子每思常痛惜，将军欲说合惭羞。奈何仍看西凉伎，取笑资欢无所愧；纵无智力未能收，忍取西凉弄为戏？”这是一段唐王朝国耻的实录。唐王朝自安史之乱后，国力陵替，吐蕃上层统治者乘机入侵，前锋直逼唐王朝心脏地带。但王朝执权柄者和边将们却畏敌不前，宴乐忘敌，不思恢复，致使边民们长期沦落敌国，惨遭异族欺凌。《缚戎人》更是一首令人心头颤栗滴血的诗篇，一位沦陷区的男子，怀着一颗炽热的爱国心，冒死逃回祖国内地，但王朝边防军却把他当敌兵抓起来，并把他流放到“卑湿”的江南去。他悲愤至极地诉说：“设蕃被囚思汉土，归汉被劫为蕃虏。”“凉原乡井不得见，胡地妻儿虚弃捐。”“早知如此悔归来，两地宁如一处苦；缚戎人，戎人之中我苦辛。自古此冤应未有，汉心汉语吐蕃身。”在这个事件的背后，隐藏着边将们的丑恶用心，他们常用几个所谓俘虏，去蒙混昏庸的最高统治者，达到了邀功请赏的卑鄙目的。

其三是同情人民的苦难和妇女的不幸。像白居易这样真心实意地关心百姓疾苦，并大胆为他们的不幸遭遇鸣不平，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。这类作品甚多，如元和八年冬关中下大雪，诗人即想到人民大众的苦难，他在《村居苦寒》写道：“八年十二月，五日雪纷纷；竹柏皆冻死，况彼无衣民！回观村间间，十室八九贫；北风利如剑，布絮不蔽身；惟烧蒿棘火，愁坐夜待晨。乃知大寒岁，农者尤苦辛”反观自己——其实也包括所有的“官僚们”——这是不说自明的：“顾我当此日，草堂深掩门，褐裘复绳被，坐卧有余温。”因而作者不无愧怍地叹息：“念彼深

可愧，自问是何人？”只可惜他的感叹难得知音，绝大多数官僚都心安理得地享受厚禄。《采地黄者》表现农民们遇到春旱秋霜为害，粮食失收。他们只好去采地黄：“凌晨荷锄去，薄暮不盈筐；携来朱门家，卖与白面郎。”农民们拿地黄向富家换马料。“愿易马残粟，救此苦饥肠！”他们的命运还不如富贵人家的马！诗人真实地揭示了封建社会农民所处的低下地位和悲惨的生活。《上阳白发人》是揭露封建帝王对民女的掠夺和残害，这位“上阳人”被选入宫时是十六岁，“貌如芙蓉胸如玉”，“皆云入内便承恩”。但事实却是：“未容君王得见面，已被杨妃遥侧目”，因而倒霉的命运便降临到她头上来了：“妒令潜配上阳宫，一生遂向空房宿。”尤令人沉痛的是，这些被关在上阳宫的美女实际上已成了被社会遗弃的废人。“小头鞋履窄衣裳，青黛点眉眉细长，外人不见见应笑，天宝末年时世妆。”她们不知道外面已发生多大变化。这种残害妇女的不合理制度是应当废除的，所以作者最后发出：“君不见昔时吕向《美人赋》（指吕向谏止皇帝选美），又不见今日上阳宫人《白发歌》。”《井底引银瓶》写一个年青漂亮的女子私奔后，受到公婆的轻蔑：“聘则为妻奔是妾，不堪主祀奉蘋蘩。”女主人公在男方家里处境维艰，但又无脸返回娘家。她真是走投无路！作者写这首诗的目的是为了“止淫奔”，看出他是反对青年男女自由恋爱自由婚姻的。这种态度显然不可取。但他对这位处境尴尬的女子很明显地深表同情。诗最后两句说：“寄言痴小人家女，慎勿将身轻许人。”正是出于同情才有此劝告，这个劝告是必要的。这里顺便说一下《琵琶行》。这首长诗是诗人贬官后写的，但诗人对妇女不幸的同情并未改变。《琵琶行》是一首影响极广的传世名篇，诗写了一位在京城曾经是千万人追捧红极一时的名伎：“十三学得琵琶成，名属教坊第一部；曲罢曾教善才伏，妆成每被秋娘妒。五陵年少争缠头，一曲红绡不知数。钿头云篦击节碎，血色罗裙翻酒污。”但年大色衰，就

没有人再去理她了：“暮去朝来颜色故，门前冷落鞍马稀。”最后只好“嫁作商人妇”。而商人的特性是爱钱不爱人：“商人重利轻别离，前月浮梁卖茶去。”“去来江口守空船”。她“夜深忽梦少年事，梦啼妆泪红阑干”。白居易对琵琶女的处境深表同情：“座中泣下谁最多，江州司马青衫湿。”因为他与琵琶女有着相同的经历：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。

白居易被贬黜江州之后，思想上起了很大变化，消极避世思想渐渐占了上风。他虽然没有忘记人民的苦难，在地方官任上也处处为百姓着想，替他们办好事，尽量履行自己的职责。但他已不上书言事了，像《新乐府》、《秦中吟》那种锋芒毕露地抨击朝政，揭露时弊，鞭鞑统治集团的贪酷暴虐、腐败无能的作品已不多见了，“兼济天下”的雄心已渐为“独善其身”所代替，所以他这时写作的诗就多围绕山水花草及个人身边一些杂事，以抒发个人的感受，表现自己的情趣。另有一些篇目甚至流露出浓厚的佛道思想。例如，他在苏州刺史任上写的《自咏五首》，其一云：“水旱合心忧，饥寒须手抚，何异食蓼虫，不知苦中苦。”其二云：“公私颇多事，衰惫殊少欢；迎送宾客懒，鞭笞黎庶难……既无可恋者，何以不休官。”看出诗人已心灰意懒，对当官已不感兴趣，归隐的思绪日益强烈。或以为诗人这种情绪与不忍当官欺凌百姓有关，这个因素是存在的，但不是主要原因。因为封建社会官民矛盾是不可避免的，官吏对老百姓的压迫剥削也是始终存在的。白氏生活年代也是如此。但他生活的前期如遇此情形，他的态度却是始终站在老百姓一边，为他们鸣冤喊屈，揭露讥刺官吏的暴虐，以期革除吏弊，清明政治——尽管是行不通的——他也要知其不可而为之，而不是消极回避，颓然思隐，《新乐府》、《秦中吟》等作品的出现就是很好的说明。所以诗人对仕途产生厌恶情绪，当为其政治上趋向消极，由“兼济天下”陷入“独善其身”的自然流露。

白居易致仕后所写的《开龙门八节石滩》则表现出他已基本上成为一个佛教的信徒了。八节滩、九峭石是伊河龙门段的一个险滩，船行至此常被碰破或撞翻，“舟人戢师”还得入水牵引。“大寒之月，裸跣水中，饥冻有声，闻于终夜。”白氏决定出资开凿险滩。诗人此举，与他一贯的同情关心人民的疾苦有关，但主要还是受到佛教的影响，即此诗、序中所说的为拨除人们的苦难，“暗施慈悲与后人”。这是佛教崇高的道德规范。白居易青年时代就与和尚有往来，贬官江州后，就企图从佛论中寻求解脱。在杭州苏州刺史任内，更是经常访僧问道。分司东都后，向佛之心更加炽热，他曾出资重修香山寺，在寺里兴建规模宏大的经藏堂。他在《早服云母散》中说：“每夜坐禅观水月”。他自称是“身不出家心出家”（《智度论》）的“自在僧”。“乐天，佛弟子也。”（《苏州南禅院〈白氏文集〉记》）“佛弟子香山居士乐天”（《香山寺新修经藏堂记》）。白居易晚年的这种信仰，使他部分诗作含有浓厚的宣扬佛理倾向。

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。他的诗歌观点散见于《策林·采官》（第六十九）、《读张籍古乐府》、《寄唐生》诗、《新乐府》、《秦中吟》序和《与元九书》等等。白氏对诗歌总的要求是：“为君、为臣、为民、为物、为事而作，不为文而作也。”为君与为民是一对矛盾。很多研究者指出，为民也是为君，其终局是为封建王朝长治久安计，这是正确的。但是，我们更应当看到，白氏并不是无条件地为君。他为君的着眼点放在“裨补时缺”，“惟歌生民病”上，也即站在揭露时弊，抨击统治阶级对老百姓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上，而不是美化歌颂统治阶级。这一点我们从白氏最有代表性的《新乐府》和《秦中吟》的六十首诗中即可看得很清楚，所以白氏倡导文艺为君为民，对百姓还是有好处的，起码可以暂时减轻他们的负担，改善他们的生活。尽管他的希望很难实现，我们也应当给予充分的注意。同时，白氏这种

创作指导思想，还有利于引导作家关心朝政大事，关心人民疾苦，写出有充实内容、有较大社会意义的作品。但是，我们也不能不指出，如果白氏把自己这种文艺观绝对化了，把它视为指导创作和批评的唯一标准，那就难免陷入片面，从而造成有害的后果。例如，他曾拿自己规定的这个标准去评判六朝文学，结果简直把六朝文学都否定了。如果真按他的标准进行取舍，丰富多彩、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学遗产岂不是早已不复存在了吗？再说，白氏这类诗大都写得“辞质而径”、“意激而言质”，“首句标其目，卒章显志”，诗的思想性的确很高，但艺术性都比较低，较缺乏艺术美、含蓄蕴藉美。所以，连作者也自叹人们对这类诗“未甚爱重”。“宜人之不爱也”。甚至连白氏自己自贬官江州以后，也不再写这类诗了，此时他写出的另一类诗，即自称“闲适诗”的，表现了作者独善其身的情志，它们有一部分或描绘祖国壮丽的河山，或抒写访亲问友的欢乐，或诉说人间的不平，或借花木抒发自己的情趣。这类诗文风深沉醇厚，笔调清丽优美，韵律婉转流畅，格调高雅清幽，为人们所欢迎，这是白氏留给我们一份不可多得的遗产，永远值得我们珍视。

中

国

诗



苑

英

华

1308832/2